

期刊·观察

回望“诺奖”得主的印记

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 郑文丰 文/图

金秋十月,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开奖周”拉开帷幕,六大奖项逐一揭晓。走过百年历程,诺贝尔奖至今已颁发了627次,人们还来不及认全“诺奖”的新面孔,最为国人所熟知的“诺奖”得主之一杨振宁先生与世长辞。但不论是“迎来”还是“送往”,总有人会记得这些在文明进程中留下印迹的人。

10月6日到8日的三天时间里,诺贝尔奖最受关注的三个自然科学奖项(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依次揭晓,九位科学家成为新晋诺贝尔奖得主。《三联生活周刊》注意到,相较于去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都和人工智能研究“深度绑定”,今年公布的三个科学奖项

可谓“中规中矩”:首先,这九位科学家都是成名已久,获奖算得上众望所归;其次,他们取得的突破性研究工作都完成于多年前,其中,今年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突破性工作完成于1995年和2001年;物理学奖的突破性工作完成于1985年;化学奖的突破性工作完成于1989年至1999年间。事实上,取得诺贝尔这三项自然科学奖项研究成果的源头,都起始于20世纪初期。

一百多年间,诺贝尔奖忠实地记录下人类科学探索的轨迹。正如《三联生活周刊》所言,人类科学探索的下一个重大发现,可能正是起始于一个有些幼稚、甚至看上去傻乎乎的提问。这意味着人类进行科

学探索的原始动力从未改变,那就是想要真正理解我们所生活的时空,以及我们自身——这才是人类文明得以持续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在诺贝尔的诸多奖项中,文学奖大概是讨论门槛较低,而热度最高的奖项。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克拉斯拉霍尔凯,“以表彰他引人入胜且富有远见的作品,在世界末日的恐怖中,再次证明了艺术的力量。”著名文化批评家苏珊·桑塔格曾将拉斯洛与19世纪的果戈里和梅尔维尔相提并论,称之为“当代最富哲学性小说家”,但也正因为“最富哲学性”,他的作品并

不那么容易阅读。实则阅读拉斯洛的作品之难,连专业读者也不免“生畏”。从事匈牙利文学译介的翻译家余泽民就曾提到,他第一次翻译拉斯洛的小说,仅约9000字的体量就足足花费了一个月之久。

但拉斯洛与中国十分有缘,在作品译介的层面上,过去的十年间,他的代表作《撒旦探戈》和其他两部早期作品《仁慈的关系》《反抗的忧郁》相继被余泽民翻译成中文出版;另一部由舒荪乐翻译的短篇小说集《世界在前进》也在今年出版。在情感层面上,拉斯洛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按《中国新闻周刊》的梳理,拉斯洛1990年第一次踏上这片遥远的土地时,便生出了深深的迷恋,

不仅称这里是“世界上仅存的人文博物馆”,回去后还要求全家人改用筷子吃饭。拉斯洛尤其喜欢唐代诗人李白,喜欢他的豪放、他的律动,喜欢他无尽的能量、流浪的心性。1998年5月,拉斯洛又沿着李白曾经走过的足迹,漫游了泰安、曲阜、洛阳、西安、成都、重庆等近十个城市,沿途做了大量采访,有诗人、学者,也有游客、百姓。不管遇到谁,话题总是离不开李白。

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先生,也是极具国民知名度、好感度的诺奖得主。他于10月18日去世的消息一经确认,全网哀悼。《新周刊》梳理了他生命中的许多个重要片段,回望这位见

证了世界百年巨变的智者:1956年,他与李政道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律”,并于次年共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这一突破,也为后来的物理研究者点亮了方向;在辉煌的科

学成就之外,杨振宁也是一个真实而温暖的人。2017年,已至耄耋之年的他选择放弃美国国籍,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从合肥到西南联大,从芝加哥到石溪,最终回到清华

园——他的人生轨迹,正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追寻科学与理想的缩影。

这位1922年生于安徽合肥的探索者,用跨越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在探索世界的奥秘中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杨振宁却以一个诺贝尔奖向世界证明:中国人凭借不懈的努力,同样能够攀登科学的高峰。

■文学期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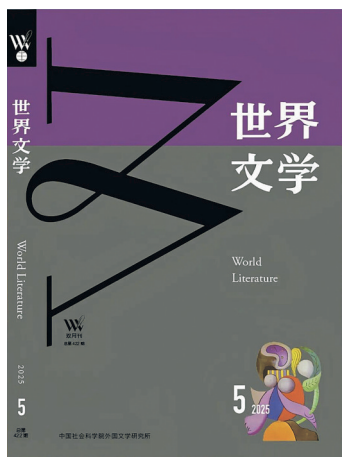
走进当代世界反战小说

《世界文学》2025年第5期,双月刊

在诸多文学母题中,最能体现极端性的莫过于战争类文学。不论是环境的塑造、社会结构的变化、人性的展现、未知的探索,无不处于极端之中。以至于几乎所有优秀的战争文学,在揭示战争残酷一面的同时,都充满了反战的倾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之际,最新一期《世界文学》杂志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组反思战争暴力本质的当代小说。

“哪怕战争结束,也走不出战争。”战争的残酷性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侵入整个社会肌理,潜入生者的身体内部,甚至渗入其意识深处。杂志选译了法国著名短篇小说家安妮·索蒙的三篇短篇小说,表现的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普通人心中留下的永久创伤,其中,《他们来了》一文表现得最为充分,小说以失智老人的内心世界为画布,以关小黑屋和住孤老院为引线,将当年等待屠杀的荒诞场景和如今不能自理的“囚徒”生活相拼接,铺展出一幅有待我们在细读阅读中重新结构的心理镶嵌画。安妮·索蒙是法国当代短篇小说创作领域的标杆人物,其作品因其对人性和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受到广泛赞誉,常常以简洁的语言和紧凑的情节揭示出人性的复杂与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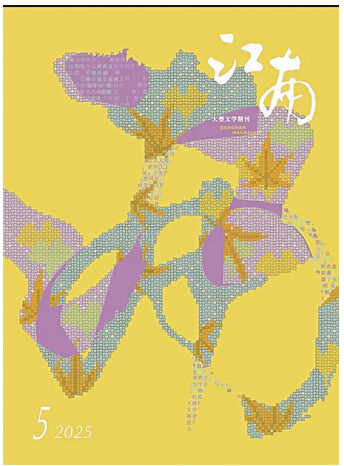
荷兰作家哈里·穆里施的《马苏罗中士怎么了?》将参战人员作为展示心理创伤的标本。俄罗斯作家亚历山大·卡拉肖夫的《香烟的味道》同样记录了参战将士的人生际遇和心灵创伤。作者以车臣战争为背景,采用回忆录的形式记述了主人公从秋天入伍到负伤退役的经历。



和战争的残酷相对应的,是孩子的单纯。杂志选译的西班牙作家阿尔曼多·洛佩斯的《那年四月》一文,则从孩童的目光来透视二战期间佛朗哥独裁政府统治下的社会状况。小孩子对现实秩序的惶惑不解,与遭羁押父亲的隔墙相伴,在精神高压下的漫长等待……都给这篇小说的批判性增添了格外动人的力量。俄罗斯作家库斯丘·涅波玛的《那个遥远幸福、公平正义的世界》同样从少儿的视角来审视法西斯暴行带给广大人民的深重灾难。不同的是,涅波玛通过主人公临刑前的遐想,巧妙虚构了一个超越苦难现实的美好世界。

莫桑比克知名作家莉利亚·蒙佩雷的小说与其故国的历史及社会现实紧密相连,侧重于探讨种族、阶级、性别等问题。其小说《那是另一场战争》将20世纪莫桑比克两场重要战争串联起来,在不否认战争破坏性的同时,蒙佩雷借助人物视角表达了自己对莫桑比克独立战争和内战的不同态度。

总而言之,杂志选用的多篇反战作品或以二战及战后初期为时间背景,或从当代生活出发探寻那段历史记忆,表现出战争造成的非人化影响和持久创伤。



成熟,看到了她们与生活的和解,看到了爱情当中男女心灵的相互交融和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讲师薛静以网络文学中的女性情感小说为例做了分析,认为率先诞生的“高干文”“总裁文”,塑造了不再忠诚的男主角形象,表达了女性尝试贴近权力的想象;随之兴起的具有古代背景的穿越文、重生文,女性以爱情之名介入历史,却最终发现历史不可改变,“启蒙的绝境”和“历史的终结”逐渐显现;由此生发的宫斗文、宅斗文,则是女性选择搁置被赋魅的感情,转而遵循掌控命运……她说,在这些变迁中,“文学中的爱情”其实是“社会中的人类”的缩影,不同性别、阶层、国族在碰撞之中,寻找有机互动和携手共进的方式。

■读书期刊

审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开端

《博览群书》2025年10月号,月刊

中国百年发展是一个追求现代性的过程,而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动力也是现代性。文学评论家王冰在最新一期《博览群书》杂志刊发文章,审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开端。

首先需厘清的是,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并不等同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界通常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是指1917年到1949年白话文学发展的历史,又称中国新文学史。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从鸦片战争“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即开始萌发。从晚清开始,那些优秀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就呼吁剪掉拖在后脑勺的辫子,这也是一根思想的辫子;只有剪掉这条辫子,才能应对全新文化世界的冲击,于是有了“睁开眼睛看世界”,希望以“中西会通”的文化理念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内在动力。解决中国文化诉求与现实诉求最切近的路径,是以谋求个体的启蒙来唤醒大众的个体意识,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些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提供了创作上的先导、思想上的依靠,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之路由此开启。

“文学上的剪辫子”,在作者看来,就是在语言表达、文学主题、文学形象、文学意义等方面,要与以往有实质性的变化。当时大多数人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为新的文学腾出足够的空间。于是有了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启蒙与救亡”就此成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基本主题,中国文学中的新人形象、新的意境、新的故事、新的主



题就此出现,中国文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与此同时,当时的中国“救亡”是最为紧迫也是必须首先解决的课题,“启蒙”也必须服从“救亡”的需要,中国文学只有在救亡图存中,“启蒙”主题才能获得现实的意义。由此开拓出一片新的文学土壤、历史土壤和社会土壤,使得新的文学成为了在体系、范畴上全面改良、改变乃至革命的一种文学。

“人”是中国现代化、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关键。对“人”的重新发现和定义,成了现代中国新文学的逻辑起点。文章引用《新青年》中《人的文学》一文以作概述:“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地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作者认为,现代“人”的特质,基于对个人价值与尊严的高扬;现代“人”的发现,成为了现代中国文学诞生及其新传统形成的逻辑起点,并由人的解放推进到中华民族的救亡之中,这是中国百年文学具有现代性新面貌的重要基础。

■文史期刊

一种可供借鉴的治学之法

《文史知识》2025年10月号,月刊

治学贵在得法,贵在可以借鉴甚至复制。最新一期《文史知识》刊发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双怀教授求学、研学、治学文章,有志于学的普通人或可从中获得启示。

王教授的求学经历颇为不易,他出生于陕西铜川的一个小山村里,父母都是农民,学习条件艰苦。在求学的过程中,他深刻体会到读书要用力,也要提高效率。要提高读书的效率,首先要从语言文字上下功夫,学会使用工具书,掌握读书的基本功,做到会读、会写、会用。

求学是研学的基础。王教授自述在大学期间已经开始研学活动,最终得以进一步攻读硕士,并拜入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创始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门下,攻读历史地理博士。他说,研学的过程不仅是学习的过程,而且是研究的过程,是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的过程。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观点。意思是要研究天地人之间的关系,通晓古今变化的规律,提出独立的



学术见解。一个人要想在学术上有所发展,就必须经历从求学到研学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登阶入室,进入学术的殿堂。

治学是求学、研学的升华和专业的归宿。在王教授看来,治学是指系统深入地研究学问,在某一专业领域对已有知识进行深化、创新和发展的学术行为。其目的在于采用新方法,解决新问题,产出新成果,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他介绍了自己在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地理、中国文化史等领域所做的工作,提出治学要观照现实,注重社科普及。他推崇史念海先生“有用于世”“为世所用”的治学理念,注重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相结合;认为学问之道“贵在探究,贵在通变,贵在创新”,坚守“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的学术原则。

探讨文学里的爱情变迁

《江南》2025年第5期,双月刊

从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的“窈窕淑女”到网络文学的“甜宠、虐恋”,从战火中的生死相许到都市里的日常相守——“爱情”既是文学永恒的母题,又是时代发展的镜子,折射着时代思潮与个人审美的变迁。最新一期《江南》杂志“非常观察”栏目以“文学里的爱情变迁”为主题,邀请相关专家、作家进行探讨。

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陈仓认为,爱情和社会文明高度相关,并将爱情视为人性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大多数经典爱情故事,基本发生在同一时代相对文明的群体中。那些流传千古的经典爱情,多数发生在才子佳人身上,这些人都是自我意识处于觉醒状态,人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有着知识分子的文明印记。

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徐坤从当代女性文化及女性文学研究角度,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女作家笔下男主角形象的变化,发现女性小说中的爱情男主角人物形象有较大的变迁,即从20世纪80年代“英雄出世”到90年代“英雄堕落与毁灭”直至21世纪“英雄的浴火重生”,形成了从英才到蠢才、又重新恢复成雄才的闭环。他在这种变化中,看到了在对男性爱情英雄重塑的过程中,女性彻底的独立和



追问古代书院的精神

《书城》2025年10月号,月刊

自晚清废科举、改书院为新式学堂以来,传统书院已废除了百余年。随着近些年来“国学热”的升温又出现了“书院热”,涌现出了官办、商办、学者办、民办等多种性质的书院。复旦大学哲学系张汝伦教授在最新一期《书城》杂志发表文章,比较了古今书院的不同,追问古代书院的精神。

文章首先从比较的角度,反向论述了“古代书院不是什么”。比较的对象有二:一是当今大学所设书院;二是胡适的中国古代书院“与现今教育界所提倡的‘道尔顿制’精神大概相同”的观念。在他看来,今天大学中的书院只是现代大学教育的一个附属,完全从属于现代大学的教育理念、教育计划、教育内容、教育目标和教育方法,其目的也完全从属于现代大学教育本身的目的,即完成学生的职业教育;文章认为胡适将古代书院类比为“道尔顿制”是牵强附会,“道尔顿制”的标准就是是否被名校录取,以及毕业后事业有成与否。换言之,“道尔顿制”关心的是学习的功利效果,而不是受教育者自身的人格完善和提高。而这与中国古代书院的教育理念恰好相反。

接下来,作者正向探讨了“古代书院是什么”。在缘起上,书院在宋代成为独立于官学的民间教育机构,其出现针对的是当时官学教育日渐功利化,学者入学纯为功名利禄的风气;从目的上,书院教育追求的是化民成俗,

咖啡漫游全球的历程

《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10月下,半月刊

咖啡,一种源自东非高原埃塞俄比亚的红色果实,在机缘巧合之下走出非洲、漫游世界,成为人类文明迁徙的无声见证。最新一期《国家人文历史》期刊推出咖啡专辑,讲述了咖啡漫游全球的历程。

埃塞俄比亚是咖啡树和咖啡食用的起源地。相传,一位牧羊少年卡尔迪发现山羊食用红果子后异常兴奋,由此发现了咖啡的提神功效。而后,咖啡豆被投入沸水中煮沸,香气自非洲弥漫至阿拉伯半岛,又借贸易之路传入欧洲。随着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欧洲探险家将咖啡带到了美洲和亚洲。17世纪,荷兰人从也门摩卡港偷运出一株咖啡树苗,并在其殖民地爪哇和印尼成功种植。英国则通过东印度公司积极从也门采购咖啡,并在阿拉伯海、地中海一带交易,使咖啡贸易成为其控制印度洋水域贸易的重要手段。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也决心将咖啡移植到美洲,在加勒比群岛、西班牙殖民地,尤其是巴西,咖啡逐渐扎根并广泛传播,更催生出一次次技术革新——烘焙工艺演进、浓缩



咖啡机问世,速溶咖啡诞生……与此同时,咖啡馆如雨后春笋般遍及世界各个角落,逐渐成为思想碰撞与艺术萌发的舞台。

咖啡在中国的发展则经历了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清朝末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同时也带来了咖啡。“桑园待种咖啡子,上林时见柠檬株”,在晚清文人笔下,咖啡已悄然走入汉语诗篇;中国咖啡的种植则最早落脚于19世纪的云南。经过一两百年来的发展,中国的咖啡文化既有老上海的摩登风情,也有胡同深处的北平记忆;而今,越来越多的人穿行于城市与乡野之间,探访各式咖啡空间——从贵阳的冠军名店到安吉的“村咖”,咖啡的“漫游”已成为当代人追寻美好生活的一种表达。